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集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西南边疆 民族研究

第9辑

主 编 ◎ 何 明

副主编 ◎ 李志农 洪 颖

云南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集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西南边疆 民族研究

第9辑

主 编 ◎ 何 明

副主编 ◎ 李志农 洪 颖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第9辑 / 何明主编.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5482 - 0736 - 8

I. ①西… II. ①何… III. ①少数民族—西南地区—
年刊 IV. ①K280.7 -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2604 号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第9辑

主编 何 明

副主编 李志农 洪 颖

策划编辑: 张丽华

责任编辑: 张丽华

封面设计: 丁群亚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871) 5031071/5033244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网 址: [http://: www. ynup. com](http://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 ynup. com](mailto:market@ynup.com)

制版印装: 昆明佳迪兴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420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0736 - 8

定 价: 58.00 元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西南及其与东南亚的族群互动”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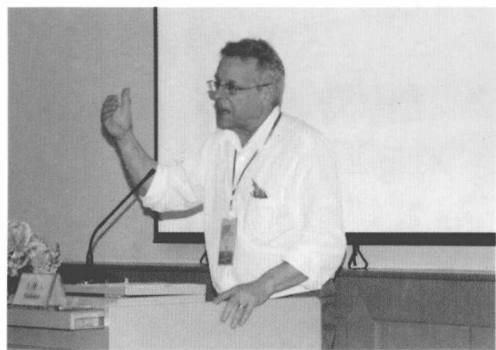
云南大学副校长林文勋教授致辞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推进，中国西南及其与东南亚族群的社会交往互动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边境民族跨越国界的族群交往互动呈现出更多更新的态势。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忠实于历变中的西南边疆民族史实的基础上，一直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开展新的民族研究领域，精深和强化中国西南以及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2009年5月19日，云南大学启动“211”三期民族学重点研究项目，直接将研究领域界定为“中国西南民族及其与东南亚的族群关系”。为了能够更好地交流和学习各国学者的研究经验，2011年6月18-20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云南大学举办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

西南及其与东南亚的族群互动”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次大会，受邀参会者除了东南亚国家之外，还有来自日本、美国、英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他们虽然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但大家均有许多共同关注的问题，都是民族问题研究领域比较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在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紧紧围绕“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东南亚族群的社会文化、中国西南边疆民族与东南亚族群的跨国流动和文化动态、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文明比较、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与中国西南和东南亚族群互动、边疆民族的和平跨居与和谐国家关系”六个主题，立足于中国西南民族及其与东南亚民族族际互动的关系事实，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西南与很多东南亚国家地域接壤，边疆地区跨境民族世代深交，全球化迅猛发展使得边贸呈现出勃兴态势，边境民族的交流互动更加多元化。大会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热心并长期从事中国西南以及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的各国学者，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应立足于边境民族地区历变的社会事实，针对中国西南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边境贸易、人口流动、跨国婚姻、宗教信仰等相关问题，相互采借研究经验，积极创造和拓展合作研究平台，扎实有效开展边疆民族研究。



与会代表发言



相互交流



“经济人类学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

郑 宇 王昊英

现代进程中的边疆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既是绝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经济人类学始终关注和聚焦的核心理论问题。2011年6月15~16日，在云南大学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二楼报告厅，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与文化产业研究院合作举办了“经济人类学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国际研讨会。云南大学副校长林文勋教授，以及社科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文化产业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

出席本次大会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分别来自澳大利亚、美国、法国、波兰、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各高校及科研机构。来自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以陈庆德教授、Chris Gregory教授等为代表的，长期关注和聚焦民族经济及其相关领域的学者们，在 multidisciplinary 的互动中就当前经济人类学所聚焦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学者们分别围绕经济人类学理论历程及其当代应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民族经济生活嬗变、当代旅游发展与民族社会文化问题、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与政策对策研究、民族经济的社会文化基础及其多样性表达、中国西南跨境民族的经济发展与社会交往等六个专题，深入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与现实应用问题。会议不仅为国内外学者搭建了交流平台，就边疆民族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诸多可行性建议，还从学科历史到学科本质，从传统核心范畴到新兴产业，从基本概念到跨学科互动，从理论建构到实践应用等方面，集中呈现了经济人类学的基本旨趣、轮廓及其当代贡献；在学科定位、体系构建与拓展范畴等方面取得了重要共识，为学科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从而显著推动了中国经济人类学的国际化进程及其发展。



开幕式中林文勋副校长致辞



何明教授致辞



Chris Gregory教授专题发言



讨论



会场



目 录

☆ 旅游人类学

旅游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研究

- 以云南大理“洋人街”为例 周大鸣 杨熊端 周 维(1)
- 从西双版纳傣族土陶与黑陶看民族工艺品与社会需求的关系 周晓红(12)

☆ 应用与发展研究

- 注重研究党的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中的催化作用 任新民(19)
- 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相关问题研究的再思考 张 宁 武 沐(25)
- 云南迪庆藏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张 实 郑艳姬(31)

☆ 边疆学

- 试述明代贵州行省的设置及其意义 段红云(37)
- 基督教乡村科技改良与川康边地社会经济变迁(1939~1955)
- 以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汪洪亮(42)
- 民国知识分子眼中的西南边疆基督宗教
- 以游记和考察文本为中心的探讨 朱映占(51)
- 1936~1937年西南夷苗代表在南京的请愿活动及其意义 娄贵品(59)

☆ 跨国民族

- 论蒙人(苗族)之分布及其生活文化的变迁 [日] 谷口裕久(69)
- 中缅“怒人”的族群建构与族群“想象” 何 林(76)

☆ 民族宗教文化

- 中国萨满教 80 年研究历程 郭淑云(84)
- 西双版纳傣族《维生达腊本生经·十祝》“十愿文”研究
- “十愿文”反映的西双版纳傣族佛教“人间”观念及其在早期佛教思想中的来源
- 姚 珏(94)

☆ 习惯法与法文化

- 论傣族传统法律中的习惯因素 胡兴东(101)
- 论傣族传统法文化之特征 刘 华(110)
- 民族习惯法产生、发展中的经济理性
- 以“赔命价”制度的产生、发展为主要考察对象 游志能(117)
- 多元视野下的法文化研究
- 兼评《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 陈小华 田 艳(126)

☆ 传媒人类学

- 文化扶贫与大众媒介:彝人媒介接触的人类学思考 方 明 刘晓程(133)
- 在场的缺场:手机对当前藏传佛教信仰实践的影响
——基于迪庆藏区田野调查的阐释 陆双梅(141)

☆ 社会文化变迁

- 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的变迁
——以云南省德钦县奔子栏村饮食文化变迁为个案 丁柏峰(148)
- 民族节日文化现代变迁的机制探析
——以云南红河州哈播村“昂玛突”长街宴为例 郑 宇(156)

☆ 个案研究

- 村寨仪式与村寨共同体再生产
——对一个佤族布饶村寨的个案研究 黄彩文 吴晓琳(162)
- 壮族传统棋游戏及其社会文化功能
——以桂西壮乡伏台屯为例 李 虎(169)

☆ 学术反思

- 论民族学家的职业伦理 朱凌飞 王馨曼(177)
- 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对人类学的启示 陈兴贵(183)
- 张力与调适:回族的国家认同及其历史反思
——基于云南案例的研究 桂 榕(192)
- “地方性”的尝试
——对当前云南回族研究的一点思考 冯 瑜 纳 娜(199)

☆ 旅游人类学

旅游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研究

——以云南大理“洋人街”为例

周大鸣 杨熊端 周 维*

摘 要: 随着旅游业把人类学传统的研究对象卷入旅游的浪潮中来, 作为人类学者, 应关注的不是景观的开发, 或者是如何吸引更多的游客, 而应关心旅游对社区的影响、社区文化的保存以及族群的认同。以云南大理“洋人街”为调查点的田野报告表明, 面对旅游业发展中的各种影响, 旅游目的地社会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 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 关键因素是这个民族内部的文化动力或者地方文化的融合力。

关键词: 旅游人类学; 东道主社区; 洋人街; 涵化

当代旅游人类学从目的地居民、游客和客源地社会这三个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 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和观点。“关注目的地社会的人类学者认为旅游引发了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 因而把旅游看做一种涵化的发展形势; 从游客出发, 他们认为旅游活动的结构、功能与人生经历仪式 (Rites of Passage) 相似, 因而旅游可以看做一种世俗仪式; 为了弄清楚旅游的成因, 他们到客源地社会寻找答案, 认为旅游是一种上层建筑, 是依赖于其他更为根本的社会因素的。”^①

旅游人类学的研究重点是民族旅游。民族旅游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国际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科恩研究了东南亚少数民族群体在旅游发展中, 游客和旅游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 民族认同的变形及他们对旅游的反应。我国学者对民族旅游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旅游学领域, 焦点在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的保护之间关系的研究上。^② 如马晓京、段超、杨红英、徐赣力和刘晖等著文分析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他们批判地看待旅游开发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提出一系列保护民族文化的措施。^③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研究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旅游人类学的主流。如约翰·G. 佩克和艾丽斯·S. 莱皮 (John Gregory Peck & Alice Shear Lepie) 在《北卡罗来纳州三个沿海城镇的旅游业与发展》一文中, 探讨了旅游业与社区发展的关系, 得出的结论认为, 由旅游业引起的文化变迁的速度既影响社区的整合程度还影响变迁幅度的大小。与旅游业相联系的变迁的本质也必然与规则的力量来源相联系, 即变迁的本质主要取决于东道文化和外部力量两者谁是主要因素。这种力量, 既指经济的也指政治的, 是区分旅游业影响的主要因素。强大的地方力量基础有助于引导旅游业向着与当地社区和谐一致的方向发展, 有助于促进新移民融入已建网络的整合。他认为旅游业是一种具有循

* 周大鸣,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杨熊端,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 周维,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硕士。

① 宗晓莲:《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 载《民族研究》2001 年第 3 期。

② Cohen, E.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the Hill Tribes of Northern Thailand. Internationals Asienforum. 1979.

③ 孙九霞:《旅游人类学在中国》, 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 年第 6 期。

环趋势的涵化过程,在涵化各群体力量大致均衡的情况下,社区混乱和分裂会降低到最低程度。^①国内学者关注旅游与社区发展并提出“旅游社区”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旅游目的地、旅游景区以及周边与旅游活动密切联系的区域和居民。这样就把旅游活动、居民参与和社区发展整合起来了。^②

本次调查中,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调查者以各种方式参与到“洋人街”的日常生活中,做了近50个访谈,走访了“洋人街”上的大部分店铺与家庭。访谈的内容涉及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个人生活经历、家庭收入及变化、文化生活、对游客的态度、对旅游业影响的看法、对社区发展前景的看法等多个方面。在这些访谈中,涉及的对象有店铺老板、店铺员工、“洋人街”上的房东和居民、导游、政府官员和游客等人,从点和面上都做了比较认真的了解。此外,除了在互联网和图书馆中做了比较全面的资料收集之外,还查阅了大理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的资料,走访了大理市文化局、大理市旅游局、大理市中和派出所、大理市民族宗教局和大理市古城保护管理局等单位,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本研究主要是探讨“洋人街”的兴起对大理古城社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最后就洋人街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一、“洋人街”概况

(一)“洋人街”的缘起

现在的大理古城,唐代南诏、宋代大理国均以此为都,历经唐宋五百多年至元代,这里一直是云南及滇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年),将原城改建为方形城,城四面建城门楼,四角建角楼,城内建“五华楼”,大理城周长6公里,城墙高8米、厚7米,有四座城门,名称分别为通海、苍山、承思和安远,现仅存南北两座城楼。城上建有御敌楼15座,垛口1560个,外有护城河。现大理古城基本保留了明代格局,残存部分城墙,南北城门楼为1984年重建。城内街道都是南北、东西走向,纵横交错,是典型的棋盘式布局。从南到北有5条街,东西8条巷。路面由青石板铺砌而成。城内青瓦坡顶的白族民居遍布大街小巷,家家流水,户户养花。苍山溪水流过古城,注入洱海。198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大理被定为全国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同年11月,国务院又将大理列为全国44个风景名胜区之一。

在调查之前,我们在网上查找了一些关于“洋人街”的文献,几篇文章里提到了“金策”这个名字,据说他是“洋人街”上较早做生意的人。到大理后,向人询问“洋人街”的发展,又有很多人建议我们去问金策。我们在金策开的“吉姆餐厅”见到了他,谈到他在“洋人街”的发展,金策有很多感慨。

1985年,“洋人街”上还没有路灯,来旅游的外国人多了起来,但是当时交通很不发达,外国人喜欢到村庄里面转。我高中没有毕业就想出来自己做生意,但父母不同意,我觉得他们工作辛苦,想减轻他们的负担。我父母开始时反对我到洋人街发展,现在还担心政策会不会变。我当时有200元存款,是靠自己扛钢筋、水泥挣来的,那时160元一辆新单车。我就问老外,旧车怎么样,他们说只要刹车灵就可以。我就到下关买了6部旧的自行车和一些零件。1985年6月1日早上九点开门营业,九点半时,这几辆单车全都租出去了,我第一天赚了18元,那时我父母一个月的工资才36元。一年以后我有75部单车。后来,很多人都租自行车了,我觉得没有前途,外国人提出让我开西餐厅。于是我就把单车卖给农民,

① John Gregory Peck, Alice Shear Lepie. Tour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ree North Carolina Coastal Towns'. In Valen L. Smith (ed.), Translated by Zhang Xiaoping. Host and Guest: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20 ~ 222.

② 孙九霞:《旅游人类学的社区旅游与社区参与》,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买了一个冰箱、桌椅、刀叉等,那时必须到昆明去进可口可乐和咖啡,到昆明要坐两天车。我当时请了两个外国人做西餐,自己做中餐,24小时营业,我忙得每天只在沙发上休息两个小时,早上起来时满地都是钱。在洋人街做生意的12年间,我搬了八次家,大多是因为我的生意火暴,房东嫉妒,就把房子收回自己开店。我觉得搬家太烦了,就干脆自己投资50多万在博爱路修了房子,也不用担心了。其实,现在的店铺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门面,让顾客能找到我,我大部分的客人都是在网上接的。

“老木屋”西餐厅的主人盛开荣老人从祖辈开始就住在“洋人街”上,他很热情地给我们介绍了“洋人街”的发展情况:

1984年以前,洋人街上没有做生意的,这些房子都是自己居住使用。然后,大理被确定为历史文化名城,外国游客可以来旅游,但他们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招待所,当时的指定招待所——大理市第二招待所,就是今天护国路上的红山茶宾馆。外国游客大量涌入,当时政府还没有旅游管理部门,游客的吃、住、游、行、购物、娱乐都不能解决,所以,外国人就在当地老百姓家吃住,给予一定的报酬。还让老百姓为他们缝衣服,他们还说当时的扎染布好,但样式不好,就要求按照他们的样式和身材设计。这样,旅游工艺品逐渐发展起来,刺激了租自行车和咖啡馆的发展。外国人教本地人怎么做西餐。由于这里物价低,外国人住的时间较长。当时,旅馆里70%的住客都是外国人。现在这条街上的餐厅和酒吧由最初的几家发展到现在的40多家。缝衣服的小店已经发展成为了展示民族服饰的窗口,外国人常在这里订货。几乎每个扎染店后都有一个加工厂或自然村,这些店成了一个与外国人做生意的窗口,许多与外国公司有直接的业务联系。

可以看出,“洋人街”是时代的产物,它产生于对外开放的浪潮中,而它的发展却集结了众多的因素:国家的政策环境、个人的创业经历、大理当地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等等。

(二)“洋人街”发展现状

“洋人街”位于大理古城护国路中上段,与博爱路、复兴路垂直相交,交通比较便利。从“洋人街”与滇藏公路的交接处向北边走三四分钟,就到了“三月街”,在“洋人街”上工作的很多人住在这里。这样,“洋人街”所在的护国路与复兴路、博爱路、人民路、叶榆路和玉洱路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大的生活、购物和旅游区。

“洋人街”的人口构成分为两部分:一是户口在“洋人街”的居民,根据玉洱居委会的统计资料,到2003年底,“洋人街”有居民187户,525人;二是流动人口,根据大理市中和派出所2004年6月的统计,从榆安园到八达酒店这一段,暂住人口139人。这只是大理市以外的人口,户口在大理市内的人不用办暂住证。

“洋人街”上的人口来源有几种形式,对店铺老板这个阶层而言,一种是外省如福建、四川、河南、贵州、上海等地来此地做生意的人;第二种是外国人来到这里开餐馆或工作,如韩国的“汉城餐厅”和“高丽亭”;第三种是云南省内其他地区的人过来发展的,如“唐朝咖啡”的老板和“天堂酒吧”的老板是昆明人;第四种是大理本地人,如“古艺精舍”的老板是大理下关人;第五种是“洋人街”上以前的居民,如卖蜡染的杨某、卖大理石的蔡某、经营家庭旅馆的杨某一家等等。

在打工者中,70%~80%是大理本地人,且多是从大理古城附近村庄来的,只有20%左右是来自大理以外的地区,包括外市和外省。

在民族构成方面,“洋人街”上的人口包括了汉族、白族、彝族、回族、藏族和纳西族等。

与“洋人街”有直接管理关系的单位包括大理市中和派出所、玉洱居委会、大理市古城保护管理局、工商局和税务局。中和派出所和玉洱居委会主要负责“洋人街”的户籍与暂住人口管理。居

委会和片区民警配合进行清查:人员住宿情况、暂住人口情况、计划生育情况、消防问题、电线线路等,一年检查几次。国家领导人、港澳旅游团来之前,节日之前,都要进行安全检查,片区民警直接在居委会上班,还有一个协管员。平时,派出所也有便衣在“洋人街”巡逻。古城保护管理局有3个职工专门负责“洋人街”的摊位摆放和清洁卫生。据“老木屋”老板说,目前有9个政府部门来此收费:税务、工商、城建、消防、公安(治安联防费、暂住人口管理费)、卫生、防疫、环保、旅游。

二、旅游对社区的经济影响

大理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发达。接待旅游者总人数从1983年的20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481万人,接待海外旅游者人数从1983年的0.11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10万人,在2005年,大理的旅游业社会总收入达到23.89亿元。^①旅游业的发展对大理古城的影响是深远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旅游热点“洋人街”上陆续出现了很多行业,各行业发展情况描述如下:

(一) 旅馆业

“洋人街”上的旅馆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大型的带有国有性质的旅馆,如红山茶宾馆和后来的金花大酒店,都是钢筋混凝土建筑;另一类是庭院式、家庭式的旅馆,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文化特色,大多设有木结构的房屋和花园,如:榆安园、复春和、唐朝客栈、花园客栈等。大的旅行团一般住在红山茶宾馆和金花大酒店,这两家旅馆规模比较大,房间和床位比较多,服务员多是正式职工。家庭式和庭院式的旅馆,则比较注重本身的特色,规模比较小,服务人员或管理人员多是有亲戚关系的人,由于主要针对散客,房间和床位设置上也比较灵活,有标准间(房内设有卫生间)、普通间(房内无卫生间)、通铺(房内有多张床位的普通间)等几种住宿形式,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经济能力选择房间。好一点的庭院式旅馆里面有很大的花园,甚至还有餐馆、酒吧和棋牌室等休闲场所,这些设施为游客之间互相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在比较小一点的家庭式旅馆里,游客更可以与主人近距离接触,与主人一起吃饭、聊天、种花,亲身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二) 餐饮业

餐饮业是“洋人街”最有特色的一个行业,也是就业人口相对集中的一个行业,平均一个餐厅有3~6名服务员。说它是最有特色的一个行业,是因为西餐厅最能体现出“洋人街”的“洋”字,从招牌到菜单,从服务员的语言到屋内摆设,都是中西合璧,而且处处透着闲适的氛围。在“洋人街”上的中式和西式餐厅有很多家:阳光咖啡、熙禄、冰岛、彩惠居、PIZZA房、古艺精舍、唐朝、汉城餐厅、高丽亭、竹园、一线天、老木屋、天堂吧、水星、太白楼,等等。每个餐厅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古艺精舍注重茶艺,阳光咖啡主打是印度菜,高丽亭做韩国菜,天堂吧的气氛比较活跃,PIZZA房当然是以PIZZA为主的意大利菜。一般要到下午,餐厅的生意才开始好起来,晚上是餐厅的“黄金时间”,游客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餐厅,当然,也有本地的工薪族在下班后来这里消费。夜晚的“洋人街”灯火通明,旺季的时候,其他店铺是晚上12点左右关门,而西餐厅一般要做到凌晨一二点才关门。

在“洋人街”,西餐厅往往也做中式菜,因为很多中国游客即使来西餐厅也会点中式菜。而且,这种设置也体现了一种文化的融合。在唐朝咖啡,有专门针对外国旅游团的白族菜系,他们结合外国人的口味,对菜式进行再加工,12道菜一桌,很受欢迎,餐标是30元一人,包括一瓶啤酒。唐朝老板“大吹”说,这种就餐形式很受欢迎。在“老木屋”,老板盛某还会应客人的要求专门在餐厅后院组织演奏白族的洞经音乐,既宣扬了白族本土文化,也为演奏者提供了继续从事洞经音乐演奏的支

^① 《大理市年鉴》(2006),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页。

持。当我们问起旅游业发展对当地经济有哪些推动时,他给我们举了几个具体的例子:“原料无污染的大理啤酒通过洋人街推向世界,以前大理没有酸奶,外国人教我们做酸奶,我们又建议农校搞酸奶,现在他们这个校办工厂一年赚几百万;还有土豆,外国人喜欢吃土豆,以前的土豆条都是从广州运过来,现在用本地生产的,品种已经经过改良,脱毒马铃薯。”

除了进餐馆吃饭以外,游客还可以在街边品味地道的大理小吃。大理有一种特色食品叫乳扇。乳扇的食用方法多种多样,可做乳扇茶,也可以做菜,如用菜油炸黄,酥香可口。如先包豆沙,再放入油锅中煎炸,味更香甜,称为玫瑰乳扇。还可以先制作好各种调味酱,涂抹在乳扇上,手执乳扇在火炉上将其烤热,叫烤乳扇。

可以说,餐饮业是“洋人街”的标志性行业。从餐饮业中,我们可以看到“洋人街”的发展特色,也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在“洋人街”的交融。

(三) 服饰业

“洋人街”上的服饰店以出售白族的民族服装为主,这种店铺一般是从大理古城附近的加工厂里进货。以女性和小孩的款式和花色为多,一套成年女性的白族服饰价格一般在100元左右,小孩子的白族服饰一套50元左右。有的服饰店出售土布、扎染和蜡染布为原料的服饰,其中很多是从贵州批发过来,或者是店主向古城周边的村妇收购而来。另外,附近农村的会做衣服的人会上门来收布料,与服装店联系,将布料拿回去缝制,做一件衣服才2元多的加工费。用蜡染布制作的服装价格要便宜很多;还有的服饰店是从广州、香港等地进货,针对的顾客主要是大理本地的工薪阶层,以满足他们对时尚的追求,这些店里的服饰价格都偏高。

此外,还有几家服饰店是以棉、麻制品为原料,店主自己设计款式,在自有的加工厂里进行制作,形成自己的服饰品牌,如:居岩驿、楠牌、伊燕和秀泽等。这种服饰店除了做零售之外,还做服饰批发和发展连锁加盟店。这里的服饰风格独特,设计比较简约、休闲,有些也带有民族特色,色彩比较单纯,这种设计和大理闲适的生活氛围相得益彰。“秀泽”服饰店的老板尹秀泽和“伊燕”服饰店的老板尹燕是母女关系,她们都是自己设计服装,尹燕主要做国外的服装批发,秀泽主要做国内的服装批发。“伊燕”在古城有3个店,其他地方有连锁加盟店七八个,广州也有。

(四) 古玩、工艺品

“洋人街”上做古玩和工艺品生意最早的要数沙坪人。沙坪村隶属大理市上关镇,距大理古城30多公里。20世纪80年代大理旅游刚兴起的时候,外国人喜欢在古城附近游历,来到沙坪村,发现当地集市上有很多古玩出售,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经常光顾这个集市。沙坪人认识到这是一个赚钱的途径,就背起古玩和工艺品来到“洋人街”走卖,即当街兜售。后来,发展为在“洋人街”租摊位和铺面做生意。现在,在“洋人街”做古玩和工艺品生意的大多是沙坪人。他们做生意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有沿街走卖的,有摆地摊的,有开铺面的,还有专门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收集古玩的。笔者统计了一下,整个“洋人街”的古玩地摊有50个左右,摊主绝大部分是沙坪人,而且有不少是亲戚。他们的供货渠道比较稳定,每周一,沙坪集市卖古玩,有些是附近村子里的人来卖,有些是很偏僻的地方来的人,要走两三天才能到沙坪卖东西。村里人收购然后给“洋人街”这边的摊主送过来,也有卖主主动送货来的。

(五) 珠宝业

现在的“洋人街”上有很多玉器店,店铺外面的招牌上写着:缅甸老玉、翡翠A货等字样。这与两三年之前的情况差异是比较大的。房东告诉我们,街上很多玉器店是2002年以后才到大理的,因为丽江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把他们“赶”出了四方街。在“洋人街”上做玉器生意的大多是外省人,如河南人、江苏人、福建人等,其中最多的当数福建人。玉器店一般从广州、瑞丽进货,有很多河南人专营玉器批发,他们从广州或瑞丽拿货到洋人街兜售,也有一些店铺老板自己到瑞丽拿货,从

大理到瑞丽一个来回也才三四天时间,不过,很多人更愿意买广州来的货,因为广州的货雕工好,瑞丽和缅甸不会加工。河南人开始都搞批发,他们大多租房不租铺,每次从广州或瑞丽进货到大理,只是在“洋人街”或附近的地方租一间房,然后把货放在旅行箱里,走进各个玉器店兜售,或者让玉器店的老板去他租的房间里看货。福建人从一开始就做零售,零售比批发赚钱,“洋人街”卖玉器的80%都是福建人,他们很少请帮工,一般都是一家人在这里做,街上有四五家卖玉的福建人都有亲戚关系。很多工艺品店也卖玉器,不过大多是用特制丝线将玉器编成手镯或挂件。一件编工精细的手镯或挂件可以卖到百元人民币以上。这些店除了从批发商那里购买玉器之外,也到腾冲或昆明的批发市场进货。

除了玉器以外,大理还有很多卖银器的店。大理鹤庆县新华村的银器制作特别有名,当地的银器打造师傅寸发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民间工艺美术大师”。随着近年银器制造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新华村很多人来到大理古城做起了银器生意,在街上随处可见一些特征明显的招牌,比如“新华银器”、“寸家银器”等。同时,他们也保持了同村落的联系,在进货、加工、销售等渠道打响了新华村这个牌子。

(六) 按摩店

在“洋人街”中段,有一家以聋哑人为主的指压式按摩店,老板夫妇都是聋哑人,60岁左右。这个店里有员工20多人,其中有14个聋哑人。此外,还有一家分店在下关。按摩店也分旺季和淡季,本地人也来做按摩,但大多数是游客做,主要是散客,团体很少,也不会给导游提成。

按摩店老板与亚星大酒店签约,每天派3个按摩师在亚星值班,如果有更多客人,就打电话到店里叫更多的按摩师去。其他的旅馆也与按摩店有联系,有需要时会打电话过来叫按摩师为客人服务。

(七) 流动的生意——“走卖”

在笔者访谈过程中,经常从店铺老板口中听到“走卖”二字,按字面理解,就是一边走一边向游客兜售东西。在“洋人街”经常看到一群妇女坐在某个咖啡馆外面的长椅上闲谈或织毛衣,如果看到游客经过,她们会十分热情地走上去兜售东西或拉游客去住宿、坐索道、坐游船或骑马,然后,她们从游船老板或旅店老板那里拿提成。这些妇女大部分来自古城附近的才村。说起才村,又是一个受旅游业影响较大的地方。才村紧靠洱海,20世纪90年代以前只是一个小渔村,改革开放至1993年,人们的意识在日益丰富的物质冲击下有了改变,尤其是随着光顾此地的游客日渐增多,从1993年开始,才村的游船由简陋的木船逐步改建为设施比较完备的铁船,截至2003年数量在60条左右。这十年间,游船经营以户为单位,自己找客源,存在很强的竞争。2003年10月,在当地政府的主持下,才村成立了“大理州海上旅游有限公司”,船主以船入股,游船由60条裁减至20条,3家共同管理一条船,以3天为期限平均分配利润。在“洋人街”上招揽游客的很多妇女的家里就经营着游船。“洋人街”成为一个旅游信息的“集散地”,随处可以找到想要的旅游资讯。

当然,除了上述的这些行业之外,“洋人街”还有其他一些店铺,包括商务中心、网吧和书吧等。在旅游业的刺激下,“洋人街”从最初的没有店铺发展到今天拥有这么多各具特色的店铺,从最初没有路灯发展到今天热闹非凡的局面,本地人、外地人和外国人聚集在一起,使“洋人街”成为大理经济发展的一个窗口。从这些行业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旅游业的巨大经济影响。很多技术得到了提高,花色和样式得到了改进,如大理石制品和银器制品等,地方的民族的工艺品得到了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扩大了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受惠的不仅仅是在“洋人街”有房产的居民,还有古城周边的居民和村民,他们可以在“洋人街”打工或为“洋人街”的商铺供应货物:一个服饰店或工艺品店的背后可能有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的工厂做供应,扎染店或古玩店后面可能是整个村在做支持,邻近村庄每天都有人背着扎染布来延街兜售,有的人还建立了家庭工厂。“洋人街”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大理周边村落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大理的形象在这里得到了国际化的提升,很多产业从这里走向国际市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许多外地人来到大理工作和做生意,他们和旅游者共同促成了

物质消费的新需求。

三、旅游发展对地方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大理的大部分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仍然充满了地方文化的特色,大理在吸引游客的同时,展示着本地的文化风范。但是,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一些成分正在慢慢融入其中,在语言、生活方式、传统文化等方面,可以明显感觉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们不难从“洋人街”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这些影响。

(一) 语言

外来文化的影响在语言方面表现的比较明显。“洋人街”上的许多店名都有中英文两种文字,在酒吧、餐馆内都有中英文菜单,服务员多能听、说简单的英语,与外国游客进行交流,有些老板更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生意比较淡的时段,随便走进一家西餐厅,都可以看到里面的服务员拿着一本英语字典或英语书籍在学习。很多早期来“洋人街”做生意的沙坪妇女,由于需要经常向外国游客兜售工艺品,她们在介绍产品和讨价还价时还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她们有的人其实连一个英文字母都不会写。

另外,旅游业推动了大理人学习普通话,甚至汉族方言。因为大理是白族自治州,白族人口占了1/3,^①因此,在大理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人们平时都是用白族话进行交流。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大理,当地的白族人在与游客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普通话,在与汉族老板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汉族的地方方言。如果要与游客交流,掌握普通话和地方方言对当地老百姓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说明旅游业在语言方面对地方文化有一定的影响。

(二) 建筑

为了发展旅游业,大理政府大力推行白族民居。笔者从大理古城保护管理局了解到,在大理古城,绝大多数的传统建筑建造于民国年间,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右。大理古城区内原以一至二层建筑为主,70年代以来,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旅游业起步,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拆旧建新情况,但古城区内仍然维持着较好的建筑高度控制,苍山、洱海的视觉环境也基本得到保障。沿街传统商业居住建筑大多数为二层,高度控制得比较好,但有些地段有些新建筑有层数超出,目前政府正在进行整饬工作,以维持沿街界面的连续与统一。

大理古城在2000年开始实行新的房屋建造规定:建筑风格为白墙,斜坡瓦顶,淡墨彩画,古城之内只能盖2层,总高控制在7.5米,一层3米,二层2.8米,白族民居“七上八下”,一层8尺,二层7尺。不允许古城内有平顶房。

“洋人街”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答案是,这里的传统建筑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旅游业发展之前,这条街还默默无闻,有很多民族建筑,当时盖得起房子的人很少,而且盖的都是旧式房子。后来旅游业发展了,为了出租铺面,很多人家重新修房子,丢掉了很多传统的建筑材料,比如木头、石头、青砖和瓦,改为水泥浇灌了。”

家住护国路25号的杨老人告诉我们:“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条街上,我们这个老房子有100多年了。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房子‘背街’,不做生意,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外国人来,那时候这条街上除了外国人都没人了。后来先是下段发展,1999年世博会以后上段才发展起来,我家的两间门面是2001年才改造的。这条街在100多年前就两间铺面,1976年以前建的老房子大部分是木料结构的房屋。我们小时候这街道很窄,有水沟,是活水,从山上流下来的。东西向的街道以前都有沟和磨房等,现在没有了。政府在1995年左右修了石板街,改善了路面环境。”笔者所住的客栈,就是把以前

^①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大理州总人口3 001 769,其中白族997 905,约占总人口的1/3,见《大理白族自治州志》卷一。

修的照壁拆掉,在天井里修了新楼,还在新楼旁边修了3间门面。问起老板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当时“洋人街”上很多家都在修房子赚钱,所以他们家也修了。

现在,“洋人街”上临街的房子基本上都改成铺面房了,而且,很多人家都重新翻修了房子或盖了新楼。比如“老木屋”西餐厅的房子。“我的这个餐馆是这条街上最古老的一座木房,传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了,嘉庆末年修建,我家现在还保留了咸丰年间(1851年~1861年)的房产证,这座房子经历了1925年7.5级的大地震还保存至今。我这个餐厅一年接待8000到10000人次的游客,来自50多个国家。电视剧《大理有条洋人街》的拍摄地就在这里。”餐厅主人盛某很自豪地向笔者展示了保存完好的咸丰年间的房产证。

(三) 民 乐

据记载,大理的洞经音乐是明代永乐七年(1409年)由四川梓潼县传入的,以后又由大理传往云南各地。五百多年来,在代代相传的同时,不断吸收各地的优秀音乐,使其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具有合儒、释、道三教为一体的特点,成为民间音乐中的一枝奇葩,深深扎根于大理这块白族聚居的古老土地上。

为了展示这种文化,政府也做了一些工作,要求店铺在晚上10点钟以后尽量播放洞经音乐。“老木屋”西餐厅的店主盛某为民间艺人牵线搭桥,组织演出,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他会征求店内游客的意见,如果他们想听洞经音乐,盛某就会临时组织一些平时练习洞经音乐的艺人,在“老木屋”后院里开一个小型的演奏会,一边听古乐,一边吃西餐或大理传统菜肴,当然,这种机会并不多。

除了地方传统的文化因素,在“洋人街”上,还有很多从外来文化中引入的文化元素,如蜡染、流行服饰、西餐、酒吧等。这里很多蜡染的工艺品和服饰都来自贵州;“懒人堂”服饰店和香港人开的服饰店中的流行服饰和饰品把现代大都市的流行元素带到了大理;西餐厅和酒吧里永远都混合着大理地方特色和西方的文化气氛,从店里的摆设到菜单的设置,从店内的客人和服务员身上,都可以看到文化交融的影子。

(四) 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

旅游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普遍活动,对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功能也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就“洋人街”而言,旅游业的发展使这里的房租逐年高涨。在这里有房产的居民,有些留在这里自己开店,大部分都搬到了其他地方,靠出租房屋,他们每个月可以有一大笔收入。但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的社区人际关系被打乱了,老邻居之间的联系变少了,新的成员进入,带入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在社区管理方面,旅游业发展之前只有居委会和派出所等单位介入,而旅游业发展起来以后,旅游局、税务局、工商管理局、城管等部门也介入到对“洋人街”的管理中了。客栈老板告诉我们:“我小时候,邻居街坊都很熟,现在老的住户已经搬走了,或者很少出门,年轻人分散了,外地人多了,很多人我们都不认识了。”以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有酒吧了,也就有了夜生活,许多酒吧和西餐厅都是凌晨1点钟左右关门,不仅是游客,本地人也经常光顾酒吧,在这里消遣。但是,随之而来的也有青少年教育问题,旅游业使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家庭收入增多了,面对周围的各种诱惑,青少年容易互相攀比、打架甚至吸毒。有当地人告诉笔者:“有些老外在这里吸大麻(我从事麻制品生意,有时能闻出空气里大麻的味道),5年以前当地人很多吸毒的,现在少了。”

另一方面,除了电视以外,他们每天接触不同国籍、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游客,在一些观念上受到冲击,“国外游客特别明显,他们带几个月大的孩子出来玩,残疾人也出来旅游”。这些或多或少都会对当地人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产生“示范影响”。

传统文化是民族旅游地区对游客的主要吸引力量,而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又在于民族旅游地区的“认同意识”,外在表现就是服饰、建筑、节日等当地人们共同拥有的东西。但是,旅游业的发展带

来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目的地居民也就面临各种思想理念的冲击,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有巨大差别的时候,经常会产生一种“自卑感”,这很容易导致他们对其他文化的模仿,甚至可能完全脱离自己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自身文化底蕴足够强劲的民族地区才能经受得住大规模旅游开发及不同文化冲击的考验。

节日是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民族丰富多彩的节日,是大理旅游文化的重要部分之一。对大理旅游业影响较大的节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于受国家的政策影响,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春节这三个黄金周期间,都是大理旅游的旺季,团队游客增多,房价高涨,“洋人街”的床位价格一般都会涨一至两倍。第二类,大理当地的传统节日也因为旅游开发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大理古城西门外有一个盛大的各民族物资交流会,就叫做“三月街”,从1991年开始,大理政府把这一传统盛会定为三月街民族节。它不仅是一个物资交流大会,还是一个民族文艺、体育表演及各民族团结的盛会。节日期间,整个大理都沉浸在节日的喜悦和激情中。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充分利用“三月街”这个旅游资源,不仅对其加大宣传,还专门修建了三月街一条街,为三月街活动专用场地。再如,火把节的举行时间是农历的六月二十五日,它是彝族、白族和其他一些民族的节日。诸如三月街和火把节这样的地方传统节日更多地吸引着自助旅行者的目光,特别是外国游客。游人在这样的节日庆祝活动中可以完全放松,融入当地的文化氛围中。在某种程度上,大理当地的传统节日因为旅游业的发展而吸引了更多人的参与,被打上了旅游时代的烙印。第三类,随着外国游客的增多,情人节、圣诞节等“洋节日”的气氛也特别浓厚,特别是在“洋人街”,外国人、收入较高的当地人和一些专门从外地赶来过节的游客汇聚在这里,使平日热闹的“洋人街”更添了几分西方文化的色彩。

在工作方面,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古城或古城附近务农的一些农民直接或间接地加入旅游服务业,如当导游、服务员、摊贩等。在农村,也有很多妇女利用农闲时间做刺绣、扎染和缝纫。在大理,很多下岗工人也靠旅游业为生,他们可以免交工商管理费等费用,为别人打工或在街边摆摊卖凉米线、烧饵块、烤乳扇等。以前洱海边有很多打渔人家,现在他们也不打渔了,变成招徕客人去坐船,改变了谋生的方式。现在木船被铁皮船和机器船代替了,他们的工作也没有那么辛苦了,而且赚的钱也多了。

在旅游业的影响下,大理传统文化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一些传统的东西被搁置了;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游客和外来人口的增多,当地的文化传统也吸纳和采借了一些外来文化元素,人们拓宽了社会视野,一些地方工艺得到了更好的改进和利用。旅游业的发展刺激了人们对民俗的兴趣,有利于人们对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鉴赏与认同。但是,旅游的发展在社会文化上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犯罪个案增加的问题和文化商品化的问题。在调查过程中,有些人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以前主要是白族文化。现在变味了,商业味太浓,白族传统的东西受到了冲击。比如,以前都是穿白族服装经营,现在没有了,现在成了珠宝一条街。没有特色,土不土,洋不洋。现在肯德基和佐丹奴等都想来,但我们这里消费水平低,游客都想欣赏民族的东西。”但是,在现代交通和通信如此发达的前提下,任何民族和地方都不可能一味“自守”,他们必须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如何才能保持自身的独特性,最大限度地保留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关键在于这个民族内部的文化动力和民族或者地方文化的融合力。

四、讨论与结论

“洋人街”的出现和发展固然是文化碰撞与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但又离不开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这个大环境。透过“洋人街”的发展,我们了解到,旅游业的发展使大理城镇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方便游客出行,大理的道路交通条件明显改善;居民的经济意识增强了,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当地的旅游发展中,如:家庭旅店、特色餐馆、农民导游、种植改良土豆,民族工艺品的加工和销售等,这些都是吸纳当地人就业的重要途径。随着大理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很多外地人来到大理,参与这里的经济建设,他们带来了资金与经验,也带来了自己的观念与生活方式。但是,大理文

化具有较强的融合力,无论对游客,还是对来此做生意的人,都能够平和地接纳他们,同时,也发展出了一些新的生意模式。

从旅游对东道主社会文化影响的角度出发,人类学认为旅游是一种涵化的发展形势。涵化(acculturation)意指由不同文化之个人组成的群体,因持久地相当集中的接触,两者相互适应、借用,结果造成一方或双方原有的文化模式发生了大规模的变迁。^①在旅游行为发生过程中,不同文化因相互接触和交流而发生变化,东道主社会的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改变。在接待游客、发展经济的同时,大理接触了不同的文化,自身文化也必然受到了一些影响,从语言、建筑风格、生活方式、劳作方式、房屋装饰、服饰、民族工艺品的制作等方面都有体现。在与不同文化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一些传统的文化被搁置了,旅游活动中的金钱交易使东道主社会居民的经济观念越来越强,经济因素成为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方面,出现了文化商品化的现象。但也有一些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传统工艺得到了发扬,大量游客出于对异文化的探寻来到大理,让大理人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吸引力,引起了他们对自身文化的重视和保护。从某种程度上说,旅游业增强了大理人的民族认同感或地方文化认同感。人们依靠地方文化获得经济利益,民族自信心得到增强,对外来文化可以保持一种从容的态度。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旅游目的地居民也会对民族传统文化或传统的地方文化加以改造,导致地方文化的加速变迁,如按照游客的要求布置房间内的摆设、设计扎染的图案等;旅游业的发展也加速了民族文化或地方文化的分裂,展示给游客看的是一种文化,自己民族内部恪守的又是另外一种文化。比如,很多年轻女性平时已经不再穿着传统的民族服饰,但是为了招揽游客,她们在工作的时候每天都会穿着漂亮的民族服饰。

“洋人街”在各种文化交汇与碰撞中发展。从以往的发展经验中,我们可以预测,大理的传统文化既不会全部得到保留,也不会全部消失。那些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元素如一些民族手工艺,得到了传承和发展;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特质得到了削弱或改造,比如在城市中,民族服饰仅仅被作为一种文化的展示形式。游客及其言行会成为东道主社会的模仿对象,对当地文化产生影响,表现在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最直接和最明显的模仿是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衣着打扮、语言、生活态度等。“洋人街”虽然有很多民族服饰出售,但这是面对游客的推销;大理本地人,特别是本地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关注流行服饰的发展,他们会观察游客的服饰,然后按照这些服饰的款式选购自己的衣服。还有很多人会染发、到酒吧里过夜生活、习惯于吃西餐或者模仿游客的其他行为。

旅游给大理社会带来相当大的变化的时候,居民们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接受这种变化。对旅游的发展,当地居民普遍持支持的态度,认为旅游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环境,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他们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忧虑:其一,由于大理本地工业不发达,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地方经济和居民收入对旅游业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游客和外来人口的增多导致物价上涨,给无法依靠旅游业为生的当地人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其二,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对当地淳朴的民风 and 价值观提出了挑战,如就业机会的增多可能导致一些年轻女性的辍学,青少年斗殴、吸毒等;其三,旅游业有其脆弱性,比如在“非典”期间,“洋人街”的生意一落千丈,使很多人的经济受到打击;其四,传统文化的传承令人担忧,比如,年青一代不再穿着传统服饰,传统的建筑风格受到了挑战,一些民族工艺品由于粗制滥造或大批量的生产变成了廉价物品;其五,文化商品化使一些神圣的民族文化符号被世俗化了,随着商品化的发展,出现了冒充民族文化或地方文化的事物,污染了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环境。

笔者认为,面对旅游业发展中的各种影响,旅游目的地社会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关键因素是这个民族内部的文化动力或者地方文化的融合力。如果旅游目的地社会具有强势的内部文化动力和融合力,就能从容地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经济、文化影响,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就“洋人街”而言,这里成为来大理旅游的游客的必到之处,说明

① 周大鸣、乔晓勤编著:《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页。